

# 災難援助與永續發展： 人類發展的多面向觀點

## Disaster Rescu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Multi-Facet Perspective for Human Development



許木柱 慈濟大學榮譽教授

**Mutsu Hsu**

Professor Emeritus, Tzu Chi University

Email: mutsu@gms.tcu.edu.tw



何縉琪 慈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副教授

**Yunchi Ho**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Teacher Training  
Center, Tzu Chi University

Email: yunchi@gms.tcu.edu.tw

### 摘要

1990 年代以後的後現代發展理論，已從古典的開發——進步的觀點，轉移至強調以人為本的永續發展觀點。本文從聯合國人類發展的多面向觀點，結合晚近社會科學的永續發展理論，以印尼慈濟人 2002 年初整治雅加達紅溪河的災難援助案例，探討多面向災難援助方案對遷村適應與永續發展的影



響。紅溪河整治案例的成功一方面固然是該方案與雅加達政府的政策計畫完全契合，但更重要的是大愛一村的遷建在經濟、健康與教育三個面向，同時滿足居民的基本需求上展現顯著的意義，使得新村居民有永續發展的契機。

關鍵字：災難援助、紅溪河方案、永續發展

##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post-modernism theory of development has moved away from the classic exploitation-progress theory and paid more atten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entered on people. This article adopts 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including ideas of the UNDP and the the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social sciences. It takes the case of Indonesia Tzu Chi Foundation's charity project of the Angke River in the early 2002 as an example to demonstrate the crucial impact of charit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concluded that the success of this project was in accordance with government policy, but mainly because it both provided significant help to the resettled residents' economy, health and education so as to create a basi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disaster relief, charity program of Angke Riv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前言

處理重大天災問題的重要策略之一有賴於自然科學的防災知識與科技，但科學並非萬能，加上人為的因素，天災的歷史經驗頗難轉化成為歷史教訓，導致悲劇不斷再現。因此，緊急而有效率的災難援助就成為無法避免的選項。本文從多面向援助的觀點，以慈濟的災難援助案例為基礎，探討多面向災難援助方案對災區永續發展的影響。本文作者認為政府

復災或 NGO 的慈善援助，必須從「全貌觀」(holism) 與聯合國「人類發展」(human development) 的角度，提供多面向而持續性的援助，透過經濟、健康與教育方案，對災區進行增能或培力 (empowerment)，千瘡百孔的災區才有永續發展的契機。

對慈善援助方案而言，人類學的全貌觀是一個有意義而具關鍵性的觀點。在探討文化的結構時，人類學家認為一個文化內部的所有要素 (elements)，例如政治、經濟、法律、家庭、教育，甚至價值觀、倫理道德……交錯結合而構成一個統合體，形成一個具有本身特色而有別於其他族群的文化樣貌；同時，每一個文化內部的所有要素，都會以獨特的方式產生連鎖反應，一個要素 (如經濟) 的改變，不管是來自內部或外部的力量，其結果不僅是該要素本身的變化，而且會影響其他要素 (如政治、教育) 隨之改變，這就是全貌觀的觀點 (許木柱，1994；許木柱、簡美玲，1994)。在進行慈善或人道援助時，全貌觀亦可稱為「多面向」(multi-facets) 的觀點。問題是「哪些面向」應該被優先重視？我們認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 自 1991 年就提出的三個人類發展指標，即經濟 (消費力)、健康 (死亡率) 和教育 (識字率)，為「多面向」觀點提供關鍵的焦點。

在此次「降低社區災害風險與災後復原」研討會中，與會學者也提出培力或增能的概念 (例如 Dr. Ljubica Mamula-Seadon，本書論文)。從發展的角度而言，外來的援助固然提供了緊急而必要的資源，但只有透過對於本社區的所有人員與組織的增能，才能夠讓一個受災社區從凋敝中重新站起來，才有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的可能。總而言之，慈善



援助的重要元素包括行動(即提供資源與能量)、助人者了解本地的特色與在地的能量,並讓受助者在受助過程中有機會獲得學習而有所成長。上述觀點是一個理想的模式,但包括聯合國在內的慈善援助的實際狀況與效應有非常大的差異,以世界各地的遷村問題為例,涉及的問題極為多樣而複雜。

根據相關文獻與我們實際進行慈濟實證研究收集的資料,慈濟在國內與海外的大型援助方案,都採取相當典型的多面向援助,主要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慈濟擁有慈善、醫療、教育與人文等四大志業,因此有比較充足的動員能量可將四個面向加以結合,但更關鍵的因素是慈濟「慈悲濟世」的理念,透過「人文利他」精神的實踐,最終期望天下無災也無難。在實踐其理念的過程中,「以人為本」是慈善援助時的核心,也就是以受助者的需求為基本考量,最終則希望受助者與災區能夠站起來,用慈濟的語彙,就是可以從「手心向上」(求助)轉變為「手心向下」(助人)。此外,慈濟的慈善援助不只是提供基本物資的援助而已,數量龐大的慈濟志工展現的真誠關懷與無私膚慰,對受苦的心靈具有慰藉的作用,提供受助者關鍵時刻的社會心理支持(何縕琪等,2012)。

## 遷村適應問題

大多數遷村都是為了促進地方發展,例如蓋水壩發電、興建大型工廠開發礦產、安置被天災毀棄的家園等,因而必須將原有居民遷徙至適當地點。但遷村不只是人的移動,更涉及財產、工作、資源取得、人際網絡的改變等問題,因而可能產生對新環境的適應問題。關於遷村適應問題,目前主要

有兩個理論觀點，其一為 Michael Cernea(2000) 的「貧窮風險」(impoverishment risks) 理論，認為強制遷村將面臨八個主要的風險：(1) 缺乏土地；(2) 失去工作；(3) 無家可歸；(4) 邊緣化；(5) 人口流動與死亡率增加；(6) 食物匱乏；(7) 無法享有共同資源；(8) 社會鬆散。第二個理論為 Thayer Scudder (2009, 頁 30) 所提的「四階段模式」(four-stage model)：(1) 計畫與募資 (planning & recruitment)；(2) 調整與適應 (adjustment & coping)；(3) 生態發展與社區形成 (ecological development & community formation)；(4) 將成果移交給當地，並繼續提供協助 (handing over & incorporation)。如 Scudder( 同上引文 ) 所說，這兩個理論其實並非互斥，而是聚焦於不同的面向，貧窮風險理論強調遷村可能導致貧窮的風險，四階段模式則聚焦於遷村的規劃與執行的階段。

相關的研究顯示，強制遷村面臨的主要風險依序為下列四個：缺乏土地、失去工作、食物匱乏、無法享有共同資源(Scudder, 同上引文, 頁 33)。以 2009 年 8 月侵襲臺灣，對南臺灣造成巨大破壞的莫拉克風災為例，由於莫拉克颱風在三天內帶來高達三千釐米的雨量，導致許多地質脆弱的南部山區，因為大雨造成土石流而嚴重崩塌，例如小林村緊鄰的獻肚山，即是因為瞬間大量雨水的積累，使得地層「深層崩壞」而形成土石流，因而導致四百多生命的消失(張永洲、李姿穎 2014, 頁 67-69)。在必須遷村的情況下，這四個問題確實是受災民眾面臨的主要問題。

土石流導致土地流失而必須遷村，當然也意味著失去原本的工作，同時遷移到一個新的地點，因為人際網絡的改變，社群也容易被邊緣化。食物方面，不管是農作物或其他的飲



食需求，在原居地都不虞匱乏，但一旦沒有了土地，這些都會產生問題。此外，到了一個新的地方，不熟悉當地的資源，因此也無法像在原居地那樣，共同享有自然或人力資源。最後，在新居地沒有辦法像原有的社區那樣擁有密切的人際網絡，整個社群運作就會產生問題，會變得比較鬆散。這些問題都涉及資源 (resources) 和能量 (capacity) 的問題，一個新社群必須擁有這些東西，問題是如何去產生這樣的效應。

## 成功的案例

審視過去的遷村，曾經出現過幾個成功的案例。第一個是 1950 年代，在秘魯的維哥斯山谷 (Vicos valley) 印地安人社區所進行的計畫變遷 (planned change)。歷經西班牙三百多年的殖民統治，秘魯在 1821 年獨立，但長久居住在當地的印地安人，直到 1950 年代，仍然受僱於地主，就像在殖民時代，依然是僱農的身分，要將大部分農作物的收成繳交給地主，因此長期處於貧窮狀態，而且萬事皆聽命於地主，因而不需要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家園與社區。康乃爾 (Cornell) 大學的人類學家 Holmberg 教授及其學生，於 1950 年代初進入維哥斯，協助進行該社區的計畫變遷，一方面透過籌集的資金，向當地政府與地主承租大片土地，然後以極低的租金轉給印地安人耕作，並引進新的技術，對土壤、農作物品種、肥料進行改變，提高農業所得；另一方面引入教育資源，讓婦女也能識字，同時教導族人會議與管理制度，讓他們能夠自行運營自己的社區，經過七到十年之間，維哥斯成為一個非常成功的應用人類學案例 (參見謝劍，1989)。

1963 年，美國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特別製作了一個影片，名為 *So That Men Are Free*，說明在人類學家鍥而不捨的協助下，這個印地安社區成功變遷的案例，透過經濟與教育面向的投入，他們最後終於獲得了自主性，能夠管理自己的社區。除了這個紀錄片，還有好幾本書出版，其中比較完整的一本是由 1953 年即在維哥斯進行康乃爾大學人類學博士論文研究的 Clifford Barnett 等人所撰寫，於 2010 年出版的 *Vicos and Beyond: A Half Century of Applying Anthropology in Peru* 這本書，從它的副標題就可了解這是將人類學知識運用在維克斯印地安社區的成功案例 (Greaves, Bolton & Barnett (eds.), 2010)。這個社區經過七、八年到十年的時間才逐漸看到成果，我們認為主要的因素在於經濟改善和教育投入這兩個面向，一方面讓維哥斯印地安人的基本生活有所改善，而且透過教育的投入，不僅讓他們識字，並知道進行會議的方式，最終可以達到自我管理，並持續發展。

第二個成功的案例是 1970 年代，在哥斯大黎加的亞雷納湖 (Lake Arenal) 建水壩的方案。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湖，但政府為了發電的需要，決定在這個湖做一個水壩，讓湖水升高，湖水面積擴成為三倍大，這個湖的發電提供哥斯大黎加 12% 的電力。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水力發電，但是湖的面積變成三倍，就會淹沒原本在湖邊的兩個村，因此必須將這兩個村遷村。這個遷村發生在 70 年代，根據 G. Stocks(2012) 在西雅圖舉行的第 73 屆美國應用人類學會年會的報告，亞雷納湖遷村的方案經過相當縝密的規劃，雖然最開始也遭遇上述遷村適應的問題，但最終也成為相當成功的案例。從最近的網路資



料看來，現在亞雷納湖旁邊已經發展出很好的社區，是一個很好的旅遊觀光景點。那些當初被遷村安置的居民，大致上也有了安身立命與發展的契機。

### 雅加達慈濟大愛村案例<sup>(1)</sup>

慈濟是臺灣一個大型的非政府、非營利的慈善組織，自從創辦人證嚴法師於1966年創立慈濟克難功德會之後，就積極進行慈善工作，從臺灣島內的慈善援助，到1991年開始進行海外援助，超過半個世紀的慈善援助，締造了許多亮麗的典範模式。本文兩位作者有幸組成跨領域的研究團隊，進行其中兩個案例的實證研究，即2002年在印尼雅加達整治紅溪河與興建大愛村的案例，以及2009年3月因為莫拉克風災的侵襲，因而在高雄杉林鄉（現已改稱高雄市杉林區）為災民興建慈濟杉林大愛園區的案例。從前述的兩個理論觀點而言，我們認為這兩個案例都是相當成功的案例。由於篇幅的限制，下文擬以雅加達整治紅溪河的慈善援助為例，彰顯多面向援助的重要性。

印尼首都雅加達地區遍佈著十三條主要的河流，紅溪河(Kali Angke)是貫穿雅加達都會區的一條重要河流。隨著印尼1980年代的經濟發展，許多居住在農村或偏遠地區的印尼人，為了尋找工作而湧入雅加達。其中有上萬人在紅溪河兩岸以鐵皮和木材搭蓋違章建築，並以紅溪河為丟棄垃圾與排泄物的場所，使得紅溪河受到嚴重污染，原本寬達七十公尺的河道縮減至三十公尺，優氧化的結果使得原本清澈流暢的河水逐漸變成烏黑色，流速驟減。

紅溪河居民這種環境與生活品質問題，在 1990 年代已引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的注意。為了解決雅加達灣的環境汙染問題，其轄下的「海岸與小島環境與發展小組」(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Coastal Regions and in Small Islands，簡稱 CSI)，特別在 1997 至 1999 年，和當地的兩個研究單位（印尼理工學院 (Indone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印尼大學人口學研究所)，以及三個非營利的基金會 (Bina Swadaya、Muara 和 Kirai) 合作，在雅加達灣和紅溪河地區的幾個社區進行自然生態與社會經濟調查，研究對象包括雅加達地區的卡布村 (Kapuk Muara) 和卡莫村 (Kamal Muara) 及其他小島的海邊社區。

這一份由 CSI 研究小組發表的研究報告，對於當時居住在紅溪河畔這兩個社區的遷居歷史、族群組成、經濟狀況與生活水準等面向，都有相當清晰的說明，其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這兩個社區的居民由於長期接觸被垃圾與排泄物所污染的河水，因此顯現相當嚴重的下痢、霍亂及腸胃道疾病 (UNESCO, 2000)。

UNESCO-CSI 在其研究報告的結論中，具體建議印尼政府未來除了進行河川整治之外，亦應「進行以社區為基礎的垃圾與廢棄物處理和資源回收的工作，而且必須佐以衛生教育的推動」(UNESCO-CSI, 2000，頁 54-56)。對於如何保護海岸地區與小島的脆弱環境，以及如何獲致永續發展，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質問題，CSI 在它的網頁中提出一個整合性的海岸管理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 建議：「無論是在計畫或行動階



段，都必須結合社區、資金提供與管理階層，以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專家。」在都會區部分，該報告書建議：「在雅加達……地區，應以住在沒有都市計畫的內陸地區(kampung)的貧困居民為目標，透過紮實的廢棄物回收，協助他們創造工作；使工人及其家庭可以安心地在小型商業或市集工作；為婦女及中輟的高中生提供就業機會；在正式與非正式教育方案中融入環境教育」（UNESCO-CSI 2000，頁 56；參見許木柱，2012a）。

當這些建議還停留在紙上談兵的時候，2002 年初的一場大雨，卻意外地由印尼慈濟人將 UNESCO-CSI 的構想提早推動。2002 年初的大雨，導致雅加達地區河水氾濫成災，嚴重癱瘓擁有一千二百萬人口的大都會區。這個嚴重的水患引起印尼慈濟人的關注，並在慈濟功德會創辦人證嚴法師的開示下，迅速進行紅溪河「五管齊下」的整治：抽水、清掃、消毒三路齊下以整治紅溪河，接著進行居民的義診和遷建。

五管齊下的紅溪河整治計畫固然緣起於水患的急難救助，但擴及環境衛生、醫療和居住的援助。慈濟基金會印尼分會籌募遷建經費，在印尼政府提供的六公頃土地上興建可容納 1100 戶的大愛一村，約 900 戶民眾在 2003 年七月遷入，2005 年六月更接近海口的大愛二村 580 戶興建完成。紅溪河沿岸難民遷入這兩個新村之後，逐漸形塑出一個獨特的社區文化風貌，入住民眾對未來也展現出較為正面的期待。大愛一村和大愛二村的主要居民，原先都居住在前面提到的 UNESCO-CSI 研究過的卡布村和卡莫村這兩個靠近海口的社區。

從 1980 年代的清澈見底到 90 年代的髒亂污染，紅溪河這一

條雅加達的「黑色心臟」，刻劃了印尼經濟發展的軌跡，也見證了過度開發帶來的社會問題。2002年初雅加達地區的那一場大雨，由於慈濟基金會創辦人證嚴法師的開示，啟動印尼慈濟志工投入整治紅溪河的全方位計畫，特別是雅加達大愛村的建立，終於改變了紅溪河畔居民的命運，讓他們有永續發展的契機。

雅加達慈濟大愛一村的興建，一方面使紅溪河上違章戶在遷村後，有一個良好的居住環境，包括二房二廳相對寬敞的住屋、可安心飲用的自來水系統，以及足球場、籃球與排球場等運動場地，另有三個販售區讓住戶申請販售生活必需品，同時設置社區管理委員會，並透過居民會議制定具有約束力的管理公約，使得社區內的社會秩序較鄰近社區安全有序；社區內並設置從幼稚園至高中職等各級學校，學費比外面公立學校便宜，更因學校的努力，不僅快速降低輟學率，更使得學生的教育表現迅速提升至前段班，獲得家長在教育上有高度的滿意（何縉琪、謝瑞君，2012）。

此外，社區內還蓋了一個醫院，不僅保障居民的一般健康，更迅速改善紅溪河居民比較嚴重的肺結核與皮膚病。而在社區、學校和醫院內持續推動人文、環保方案，更使得大愛一村成為印尼政府展現給外國貴賓的典範社區，印尼政府甚至計畫模仿大愛村的建築與管理模式，興建一百萬戶國民住宅。雅加達大愛村的興建也讓印尼人對華人的族群刻板印象獲得改善。我們在2007年進行的實證研究顯示，在大愛村的印尼學生與家長，一改過去對華人比較負面的刻板印象，現在則相當高比例傾向於正向，認為華人聰明、整潔、勤勞、有禮貌、



有效率等。族群的互動也比較好，願意和華人有商業、財務的關係。

我們認為在紅溪河整治的效應中，包括住家、學校及社區在內的學習環境，是影響個人及文化發展的關鍵因素。大愛村的住宅及附設的學校、祈禱室、義診中心等，提供一個全新的硬體及軟體環境，一方面讓村民的基本需求獲得某種程度的滿足，同時在管理公約中引進清淨家屋、社區環保，以及不賭博、不喝酒等新要素，雖然居民在適應初期有些不習慣，但卻有效改善了家庭和諧與社區生活的品質，以及宗教間的藩籬；而學校提供的優質學習環境與教師對學生的期待與付出，不僅明顯提升了學生的教育表現，而且也看見一個有別於紅溪河畔的未來，更見證了族群藩籬的拆解與社會發展的契機。

我們在該研究的結論中，認為雅加達大愛村的成功展現遷村適應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環境的人文化育、慈善的宗教人文、人品的教育實踐、大愛的族群膚慰、政府的感動回應，以及發展的堅實永續（許木柱、盧蕙馨、何緝琪，2012）。我們在結論中認為這個遷村方案的成功，主要取決於下列三個原因：一、整頓紅溪河的違章建築原本就是印尼政府既定的政策，2002年的大雨等於是臨門一腳，使這個政策提早實現。二、印尼慈濟人秉持證嚴法師的期待，以堅毅的使命感展現付出無所求的精神，使得遷村的複雜性降低，化解了宗教與族群的距離。三、最重要的是多面向的援助，慈濟的援助強調三安，基本的三安包括：(1) 安身——身體必須有所安置，有房子可住，土地也很重要；(2) 安生——生活（經濟）無虞，

生命安全(健康)；(3)安心——心靈安定，教育能夠讓他們有一技之長，同時透過人文利他與環保方案的推動，能夠發展慈悲心與利他精神，不僅對當前的困境不再擔心，對未來也有新的展望。大愛一村的建置包括住屋、學校、醫院、乾淨水源、祈禱室、市集、環保站與小型工廠，不僅提供了優美而安全的環境，同時還提供就業訓練與工作機會，滿足了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包括經濟與健康醫療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大愛一村的教育設備與課程設計，不僅快速改善學生的學習表現，而且也提升學生利他助人與孝順的品格。學生的表現連帶地影響了家長的滿意度，以及對學生未來的教育期望(何縉琪、謝瑞君，2012)。

## TZU CHI FOUNDATION 慈善援助與永續發展<sup>(2)</sup>

社會科學界一向關心社會及群體的適應或發展問題，但不同的研究者對發展的定義與內涵擁有不同的觀點。持現代化理論觀點的研究者，將一個社會的發展和現代化劃上等號，而且進一步將現代化和高科技、國際化或全球化也劃上等號，因此將探索的焦點放在如何加快現代化的腳步，也就是加速引進高科技。但是後現代理論觀點(post-modernism)卻認為這樣的觀點是科技發達的西方國家進一步剝削低度發展或未開發國家的策略；全球化的目標與結果不僅無法解決那些國家的貧窮或健康問題，反而擴大了世界性的貧富懸殊。

根據後現代理論的觀點，一個發展計畫必須考慮受援助者的基本需求和條件，否則一個用心良善的發展計畫也可能失敗。例如澳洲政府在肯亞的發展計畫，由於該計畫沒有參考



過去的開發經驗，也沒有考慮當地的歷史與環境，更沒有運用當地居民的傳統知識，缺乏從當地民眾本身的立場去考量（即人類學所謂的文化主位觀點），而且還挾帶著西方知識和經驗的優越感，最後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Porter, Allen and Thompson, 1991；引自沈台訓譯，2003，頁 4, 27-33)。

在論及現代社會的發展時，Paul Ekins(1992:203) 語重心長地提醒，不要將西方富裕國家單一標準的發展模式套用到所有國家。在探討穆斯林國家與基督教世界的合作契機時，Suha Taji-Farouki (2006，頁 110-111) 引述聯合國的《1999 年人類發展報告》(The 1999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認為世界各地的發展狀況在平等、包容、安全和永續等四個面向，都有所不足，因而提醒各國：全球的發展應以「人」為核心，而不是只考慮「利潤」，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各國應具有共同的核心價值、標準與態度，而每一個人、政府、法人與公民組織，都有責任與義務。

這些近代的發展觀點凸顯出古典發展思維過於簡化與單一性，至目前 2018 年的實際發展而言，即使全球化與現代化的呼聲已經是全球的共識，但世界各國並非如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所說的完全走入同質的現代化景況，而比較像杭廷頓 (Samuel Huntington) 所主張的文明的衝突或多元文化的並存。進入二十一世紀，越來越多的學者採取相似的看法，例如 Schech & Haggis (2000)。發展研究學者 Deneulin & Shahani (2009) 更進一步強調：真正的「發展」絕非只有經濟層面的提升，例如國民所得、家庭收入或消費力等，而是要讓更多人共享正面的人文價值，而且應該涵蓋三個重要的概念：(1) 功能運

作：該社會組織或制度可以良好運作，促成社會的發展；(2) 促進發展的能量：該社會有足夠的自由去選擇或創造可以順利運作的制度或組織，而且可以使用可用的資源；(3) 能動性 (agency)：該社會應具有足夠的能動或執行力，可以促進正向、多元的發展。此外，還必須兼顧與這三個發展概念相關的四個原則：公平、效率、公共參與和永續性。

這些後現代的發展觀點非常合適應用於慈善援助與發展的課題。紐西蘭的環境人類學家 Veronica Strang，在 *What Anthropologists Do* (2009, 頁 28) 一書中，認為在慈善援助中，提供食物和水，與減少貧窮經常重疊，是一體的兩面，亦即提供援助在提供緊急援助之際，也在鼓勵發展。在「降低社區災害風險與災後復原」研討會中，我們注意到來自土耳其的 Karanci 教授提到的相關論點，他認為在災害風險治理中，社區韌性 (community resilience) 的強化應該包含三個元素：(1) 行動 (action)；(2) 資源／能量 (resources)；(3) 學習 (learning)。制度化的社會服務與社會資源會為社會韌性帶來能量，組織所提供的物質展現人際間的關懷，以及對需要者的關心，會讓受助者心理上感到溫馨，具有相當大的心理膚慰功能 (參見本書論文)。此外，Ljubica Mamula-Seadon 博士認為：「在透過制度性的架構促進增能的脈絡下，才可能會導致適應與學習。這需要一個治理系統，其制度會導致有意義的投入，而且會強化社會資本」(見本書論文)。換言之，只有透過讓受災者增能，而且是屬於一種制度化的架構去協助他們，他們才有可能增加能量，能量增強，適應就會比較好，而且也較有可能學習到如何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這個理想的落實需要一個有效



的治理系統或制度，以及有意義的投入 (meaningful engagement)

從 1991 年開始，聯合國發展總署 (UNDP,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每年都會發表一份「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值得注意的是其 2014 年的報告，特別強調「人類的持續進步」(sustaining human progress)，其副標題為「降低脆弱性」(reducing vulnerability) 與「建構社會韌力」(building resilience)。這個觀點和本次研討會的主題不謀而合，都強調永續發展的問題，也就是提升社會的韌力，降低社會的脆弱性。我們認為要達到這個目標，很重要的策略就是要幫助受助者增能，甚至助人者也應該從提供幫助的過程中，領悟與學習正向的力量，並增強持續服務的動機，此為服務—學習 (service-learning) 的觀點。簡言之，增能與社會韌性是永續發展很重要的兩個概念。

Bornstein & Redfield (2010) 在《慈悲的力量》(Forces of Compassion) 一書中，建議：「在進行大型災難援助時，若注意許多細節，了解當地模式，並整合當地力量，將使慈善援助在道德與情感的良善基礎上，建構出更獨特的效應。」援助方案能不能成功，很重要的一個機制是外在的援助配合在地的力量，兩者結合不僅會產生強大的重建能量，甚至有可能促進社區的永續發展。永續發展的觀點就是以人為本，是一種終極關懷，以社區的人命、社區的發展為主要的考量。在慈善援助中，透過教育可以讓第二代有一個契機，誠如該書所說：人道援助必須「置身現在的苦難，看見未來的希望」(頁 253)。透過教育讓在地社區的年輕世代看見未來的希望，避免他們複製父母的命運，永續發展才有可能實現。

慈濟的慈悲濟世最重要的理念是「以人為本」，在進行慈善援助時，優先考慮的是受助者最迫切的需要，而慈善行動就是基於利他至上的觀念，以感恩心付出無所求。因此在進行慈善援助時，除了提供生活的需求（經濟）與醫療服務（健康）之外，通常會提供教育援助，包括課業輔導及其他的人文、環保、孝親等方案。這就是本文所主張的多面向的援助。

卡翠娜颶風在 2004 年重創美國新奧爾良後，十一位美國環境人類學者於 2005 年 9 月，針對自然災害的災後重建，提出下列七點呼籲 (Oliver-Smith et al., 2009, 頁 275-276)：(1) 應將現有的知識整合到災後重建的政策與計畫；(2) 受災者參與災後復原與重建過程；(3) 統整資源提供最大的福利給受災者；(4) 應進一步著力於職業訓練、創造工作機會、提供創業基金與信用貸款；(5) 尊重災民原有的文化、認同與權利；(6) 將災民代表納入援助體系；(7) 有效率的應用習得的經驗，以減少未來的災難。

這七個建議中，慈濟的援助在前面六點都已經做得相當成功，第七個建議則是進行式，其實慈濟至目前為止的大型慈善援助方案，都會根據過去援助的經驗，並配合不同災區的需要與當地特性，例如「以工代賑」方案在臺灣及菲律賓的成功推動，因此大致上也吻合第七個建議。本文作者與慈濟基金會文發處的何日生主任一直致力於透過實證研究，針對過去的援助案例進行分析，期望提供未來進行災難援助時的參考架構。

法國思想家 Piere Bourdieu(1990) 的實踐論觀點，認為：「人類具有主觀性與主動學習特性，社會學習並非被動學習的過



程，而是透過和他人的互動，主動發現自我與文化的過程。」我們認為溫馨和諧的人際互動是慈善援助方案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別是志工彼此之間，還有和受助者的良好互動與尊重。如果將善援助視為一種文化理念，慈善團體即是一種文化團體，形成一個文化的氛圍，彼此可以了解，相互信任。將 Pieere Bourdieu 的場域 (field) 和習性 (habitus) 的觀點應用到慈善援助，如何創造出一個比較溫馨的人文環境，就成為教育援助非常關鍵的任務。慈濟一貫強調走入人群的人間佛教精神，在慈善方面強調以人為本，教育方面著重人文教育，因此慈濟的許多大型活動，如大型手語劇、經藏演繹等，都展現溫馨感人的環境與氛圍，讓演繹者和觀賞者，以及助人者與受助者都感動於心，這樣的慈善援助模式，讓所有參與者都有所成長與學習，社群的永續發展就有可能達成。

印尼雅加達靜思堂是慈濟世界最大的靜思堂，在 2012 年 10 月啟用那一天，各階層的印尼人與華人齊聚一堂，穆斯林長老、天主教神父、佛教諸山長老與慈濟人同臺演出，展現族群與宗教的融合，場面溫馨感人。印尼的國徽是胸前放置一面盾牌的金翅神鷹，其手中的綬帶書寫著國家格言 Benneka Tunggal Ika，意思是「異中求同」或「多元中的統一」，表徵印尼政府期望透過多元與包容而達到全民團結的國家目標 (許木柱，2012b)。雅加達慈濟大愛村案例成功地展現了這個目標的落實，更見證了多面向慈善援助與永續發展間的理論關係。

## 註釋

- 1 本段印尼紅溪河整治案例完整的資料，參見許木柱、盧蕙馨、何縉琪(2012)。
- 2 本段關於發展的觀點，主要引自許木柱，2014，頁 10-12。

## 引用書目

- 何縉琪、張永州、高慧娟、許木柱(2012) 慈濟志工參與災難援助的實踐經驗。陶飛亞、劉義(編)，宗教慈善與中國社會公益(頁 178-205)。上海：上海大學。
- 何縉琪、謝瑞君(2012)。希望的工程。刊於許木柱、盧蕙馨、何縉琪(編)，曙光初現：雅加達慈濟紅溪河與慈濟大愛村研究(頁 133-178)。花蓮：慈濟大學。
- 沈台訓(譯)(2003)。文化與發展：批判性導論(S. Schach & J. Haggis 2000 年原著)。臺北：巨流。
- 張永洲、李姿穎(2014)。大地反撲。刊於許木柱(編)，山窮水盡見真情：莫拉克風災慈濟援助的實證研究(頁 53-76)。花蓮：慈濟大學。
- 許木柱(1994)。文化的力量－臺灣人類學研究的例證與再思索。刊於吳大猷院長榮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93-208)。臺北：中央研究院。
- 許木柱(2012a)。邂逅紅溪河。刊於許木柱、盧蕙馨、何縉琪(編)，同上引書(頁 1-19)。花蓮：慈濟大學。
- 許木柱(2012b)。展翅的神鷹。刊於許木柱、盧蕙馨、何縉琪(編)，同上引書(頁 xi-xvi)。花蓮：慈濟大學。
- 許木柱(2014)。緒論－災難援助與永續發展。刊於許木柱(編)，同上引書(頁 1-32)。花蓮：慈濟大學。



- 許木柱、簡美玲 (1994)。文化體系的理論架構。刊於周添城主編，文化發展計畫先期規劃研究報告 (頁 7-20)。臺北：二十世紀國家發展基金會。
- 許木柱、盧蕙馨、何縉琪 (2012)。初現的曙光。刊於許木柱、盧蕙馨、何縉琪 (編)，曙光初現：雅加達慈濟紅溪河與慈濟大愛村研究 (頁 217-235)。花蓮：慈濟大學。
- 謝劍 (1989)。應用人類學。臺北：桂冠。
- Bornstein, E. & Redfield, P. (eds.) (2010). *Forces of Compassion: Humanitarianism Between Ethics and Politics*. Santa Fe, NM: School for Advanced Research Press.
-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中譯《實踐論》)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ernea, M. M. (2000). Risks, Safeguards, and Reconstruction: A Model for Population Displacement and Resettlement. In M. M. Cernea and C. McDowell (eds.), *Risks and Reconstruction: Experiences of Resettlers and Refugees* (pp. 11-55).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 Deneulin, S. & L. Shahani (eds.) (200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city Approach: Freedom and Agency*. London, UK: Earthscan.
- Ekins, P. (1992). *A New World Order: Grassroots Movements for Global Change*. London, UK: Routledge.
- Greaves, T., R. Bolton and F. Z. Barnett (eds.) (2010). *Vicos and Beyond: A Half Century of Applying Anthropology in Peru*. Lanham, MD: AltaMira Press.

- Oliver-Smith, A. (ed.) (2009). *Development & Dispossession: The Crisis of Forced Displacement and Resettlement*. Santa Fe, NM: School for Advanced Research Press.
- Porter, D. Allen, B. and Thompson, G. (1991).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 Scudder, T. (2009). Resettlement theory and the Kariba case: An anthropology of resettlement. In Oliver-Smith, A. (ed.), *Development & Disposition: The Crisis of Forced Displacement and Resettlement* (pp.25-47). Santa Fe, NM: School for Advanced Research Press.
- Stocks, G. (2011). Evaluating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dam-caused displacement and resettlement in Nuevo Arenal, Costa Ric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Expanding the Influence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hosted by the Society of Applied Anthropology held in Seattle, WA, March 29-April 2, 2011.
- Strang, V. A. (2009). *What Anthropologists Do*. Oxford, UK: Berg.
- Taji-Farouki, S. (2006). Muslim-Christian Cooper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Akbarzadeh, S. (ed.), *Islam and Globalization: Critical Concepts in Islamic Studies* (pp. 110-142). London, UK; Routledge.
- UNESCO-CSI (2000). *Reducing Megacity Impacts on the Coastal Environment: Alternative Livelihoods and Waste Management in Jarkata and the Seribu Islands*. Jarkata: UNESCO-CSI.